

从新闻抵达人性：柴静采访风格及争议辨析

摘要：本文针对柴静的新闻专题节目进行内容分析，探究其采访风格的特质以及她对新闻基本问题的看法，辨析其职业生涯中存在的争议。案例分析指出，过往对柴静的批评有失公允。在新闻采访中，其冷静、理性的一面常被忽视。另一方面，情理交融、事理交融、人文关怀正是当今的新闻叙事走向宏大和程式化以后，学界和观众极力呼吁的元素，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有了新的价值。若抛弃人本主义的立场，过度强调客观主义，只会弱化新闻的公共性，进而丧失主体性，降格为信息传播，职业和学科的合法性也将无从谈起。

关键词：柴静；看见；人文关怀；公共性；客观主义

一、引言

虽然柴静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多年，其斥资百万拍摄的《穹顶之下》受到数据造假的质疑，但是《看见》一书仍然是众多新闻学子的入门读物，她在《新闻调查》《面对面》《看见》等电视新闻节目中的采访风格依然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豆瓣网友针对柴静《看见》一书所作书评的词云统计显示，读者的感受既包括感动、关心、悲情，也包括逻辑、理性、真实。这部讲述其央视十年生涯的自传性作品，被认为用故事真实反映了时代细节。而对于柴静其人，虽然“挺柴”者众多，但在批评者看来，她过往的采访“表演”痕迹严

重、不专业，赴美生子、指责院士、拍摄《穹顶之下》更是不可原谅。换言之，关于柴静的争议集中于情感、立场与新闻的关系。

本文试图回顾柴静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专题节目，重新理解其采访风格和新闻一词的内涵。由于《穹顶之下》涉及复杂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数据，其中论点和论据的合理性尚无定论，且拍摄该纪录片时，柴静已经离职央视，故本文不对其作展开论述。

二、对新闻和真相的认知

（一）何为新闻：新闻的本质是人

从字面意思来看，新闻指真实与最新的见闻，它聚焦事件的前因后果，呈现流动时空中的关联瞬间。从系统运作来看，新闻通过报道事实，呈现他人的生存状态、自然的演变规律与社会的运作形态，指导个人和群体调整观念和行为。

在坚持新闻信息本位^①的前提下，需要正视的是，作为事件主体的人以及贯穿其中的流动人性，更加真切且深不见底，甚至是更重要的新闻发现。因为规则的制定与违背，人们的相互爱护与伤害，利益的让渡与获取，都由人的理智和情感驱动。唯有在这个层面上，一系列的新闻事件才能从孤立走向整体，进而描绘社会的深层脉络和历史的演进趋势。

柴静认为，新闻是人性的抵达，事件是人的欲望、爱憎交织的结果，她在演讲中提到，“新闻史也是心灵史”。随着传统新闻业走向衰败，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声援。杜骏飞教授呼吁人本主义新闻学的回归，他认为新闻

^① 杨保军：《论“新闻本位”观念的实质、内容与实现》，《新闻知识》，2020年第2期。

的本质就是人，应当基于人性和事实来关怀人，帮助人实现理想化生存^①。

在媒介伦理失范行为频仍的当下，这种呼吁愈发显现出其价值理性。

将客观主义奉为圭臬的手法，对新闻事件蜻蜓点水的交代，基于法律或道德的一票否决，往往使得真实、准确、客观、公正脱离人的自由意志和民众福祉，沦为一纸空文。人性的复杂与幽深、痛苦与高贵被掩盖。这种职业规范在僵化之后会成为从业者怠惰的借口，甚至以人性和新闻业的全面崩溃为代价。

不久前，#西安男子徒步 100 公里躲避疫情管控#的新闻受到热议，几家媒体在报道时都引用公安机关的通报，简要介绍了男子的违规行为和处罚决定。若是记者能对人性多些关注，多问问为什么，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与内心抉择就会浮出水面。后续网友补充道，男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西安没有住房，也无力承担隔离期间的食宿费用，因此想要步行回家隔离。一出心酸的挣扎因为浅表化的报道成为一出闹剧，这又将人的价值和尊严置于何处？

相较而言，采访女子监狱时，柴静并没有一味指责实施家暴的男性。在给予女性充分关怀的同时，她询问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他们的丈夫在施暴时是否快乐？是否想摆脱施暴的状态？她告诉观众，从照片来看，男子并非穷凶极恶之辈。最后，她就这一问题采访专家，专家指出，施暴者同样是暴力的受害者。这种抽丝剥茧的探求、对人性的好奇和同情，让新闻展示的不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

罪大恶极的人也有其挣扎之处，虽然不值得原谅，但可以被理解，甚

^① 杜骏飞：《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 2 期。

至能引导社会各界在更深的层面反思暴力的成因。若少了这份对人类共同困境的探求，若新闻不能从人性层面促进相互理解，性别对立、种族歧视、阶层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二）何为真相：真相是无底洞的底

柴静在《看见》一书中写道，必须让缺席的一方说话和解释，这既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为了认识复杂的世界，“即便这些解释让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①。

在药家鑫杀人案中，柴静采访双方父母。节目的第一个镜头是药家鑫在弹钢琴，他说：“我感觉我的手就和我的身份一样，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犯人。”他的眼泪并不能稀释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这样一个年轻甚至有些懦弱的音乐高材生为何做出如此残忍的事？他有怎样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是如何形成的？这是药家鑫父母想知道的，也是无数家庭在教育中可以借鉴的，而真相本身足以警醒后人，传媒教育大众的作用得以彰显。

在对贵溪校车翻坠事件的调查中，通过柴静的层层追问，校车的超载、教堂请外行人修路的“善举”、路面的常年塌陷、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乡村落后的学前教育，慢慢浮出水面。在这个事故中，没有绝对的恶人，只有处于不同境况、缺乏更优选择和完备知识的个体，而它折射的是农村资源匮乏下经济、法规、教育、监管的全面落后。只有经历这样的追问，粗浅的善恶观念才能得到丰富，固执的偏见才能被瓦解。

柴静说：“真相就是无底洞的底。”由于知识、情感、立场和利益不同，

^① 柴静：《看见》，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不同主体的陈述只能呈现部分的生活经验，且其中难免掺杂情绪、误读甚至是谎言。此外，社会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事件的发生是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规则、利益、虚实、善恶、贫富相互交织，“为什么”是值得永远深究的追问。唯有撬动武断的偏见和认知的惰性，才能给出恰如其分的交代。而只有这些事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得到澄清，对社会和历史的公正解读才成为可能。

近日，《新京报》对于刘学州的报道，片面引用其生母“要求买房”“借钱旅游”“威胁离婚”的言论，呈现单一维度的事实，引发了针对这个 17 岁男孩的网络暴力。在希望破灭后，刘学州留下遗书自杀身亡。新闻事实的呈现是一个过程，并不意味着新闻报道可以放弃平衡性的原则，为了抢占独家，将片面信息传递给用户。照搬一方言论，在片尾打上一行未联系上当事人，而非挖掘可能的疑点并予以澄清，这是智识的懒惰，也是掩盖失职行为与主观偏向的手段。

当下，由于即时和碎片化的传播已成趋势，用户对等待真相逐渐失去耐心，并倾向于根据已有信息片面发泄情绪；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激愤的指责与肆意的赞美，也失去了理解复杂人性的能力。但是这种认知方式是有害的，它在限制个体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的矛盾冲突更加剧烈。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新闻媒介更应谨慎探寻真相，呈现多方面的声音和可能，给予事件双方公正的对待。

三、对情感与立场的反思

（一）客观性与情感的一致性

传统观点认为，客观就是剥离立场和情感，用同样的篇幅呈现双方视角。形式的客观和平衡固然有其必要性，却不是抵达真相的唯一准则和充分条件，因为它过于简陋。一方面，情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唯有正视情感，才能看清复杂的人事纠葛，并警惕潜藏的偏见；另一方面，纳入情感有助于新闻业承担公共责任^①。正直的情感驱动记者深挖事件，明晰的事实支撑实证主义的叙事逻辑。

客观性要求用事实说话，事实可以是当事人细微的动作、表情或是言不由衷的陈述，其中必然包含情感。《网瘾之戒》中，柴静和受治疗的孩子对话：“你觉得你是真的清醒了，还是说你因为害怕就服从了？”小张说：“真正清醒了。”柴静问：“真的吗？为什么哭呢？”小张说：“我没有。”此时画面中出现了眼泪的特写镜头。柴静继续说道：“你在流眼泪了。”小张说：“没有，我想待在这儿。”在这里，记者和编导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但是通过对话内容和孩子的眼泪，观众能够理解其中定有难言之隐，而这正是真相的一个侧面。

此外，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它只是要求排除仅属于记者个人的偏见和情感，呈现多方视角，进行公正对话。柴静对话杨永信，试图了解针对网瘾少年的电击行为是否存在，又是否科学、有效、人道。一方面，编导采用穿插剪辑的手法，展现了杨永信与受“治疗”孩子的矛盾说法。这种治疗是“循循善诱”还是“肉体刑罚”，观众自有判断。另一方面，节目不仅呈现了对电击的负面评价，也报道了求助无门的家长和被成功改造的孩子支持的声音。最终，专家指出，不伤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合

^① 《袁光锋·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法性原则，是无论目的多么正当，也不能突破的底线。正是在多方的利益博弈和言语交锋中，“爱”与“伤害”的界限更加分明，社会走向文明的路径也更加清晰。

另一方面，客观性离不开敏锐的感受和共情。《双城的创伤》中，柴静为男孩擦眼泪的动作被批驳为表演性主持。这个动作是否适合被剪辑进节目中或许有待商榷，但记者基于关怀做出这个动作并无不妥，也不妨碍客观公正。记者唯有真诚地倾听、理解、表达，才能获得采访对象的信任，进而展现一个平衡、真实而客观的世界。

在柴静的新闻节目中，很多细节都会传递出人性的纯良和温暖。比如她长时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采访对象，有时甚至连眨眼的次数都很少，采访过程中，她会身体前倾，听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她也会摇头或者下意识地做出吞咽的动作。这是一个生命在聆听另一个生命。正如柴静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所说的：“真正煽情的报道都是无情的人做的。”在客观性趋于僵化，媒体公信力尽失的当下，引导记者将价值和存在相统一，培养一种理性化的情感^①，才能真正纠偏煽情新闻和片面报道，实现客观公正。

（二）质疑性采访中对立的合理性

2010年，柴静在《面对面》节目中采访钱维宏教授，探讨气候变化的原因。柴静数次表现出的吃惊受到质疑。从B站弹幕来看，部分观众认为

^① 蒙培元：《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

她不专业，鼓吹西方立场，也有观众认为这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在替民众惊讶和发问。

钱维宏教授质疑 IPCC 发布的公告,他指出气温增暖在先，二氧化碳变化拐点在后，并预测 2030 年之前，气温将一直呈现降低的趋势，这与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乃至人们的常识确有冲突。

那么在制作这期节目时，记者从普通人或是西方科学界的角度出发，对于预测的科学性、解释力、公信力，乃至政治倾向提出质疑，确无不妥。面对柴静尖锐的提问：研究是否旨在推翻 IPCC 的结论、是否在为国家利益服务，钱教授说：“我做的工作并不是要推翻谁，而是为了认识自然”，并解释这一研究并没有课题资金赞助。这次采访无疑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和普通观众的疑问。

此外，在节目中，柴静就节能减排采访丁仲礼院士的片段，更被网友质疑为“公知”“不爱国”“说出西洋观点”。回顾采访中二人的对话，这是一次层层递进的质疑式访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国际社会对丁仲礼的质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则中国是人口大国，呼吁使用人均碳排放量计算是否合理；二是科学家是否应该在论文中表达情感倾向。在这个关口，有价值的采访应当引导当事人回应争议。而柴静对丁仲礼的采访正是围绕“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展开。

“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这句话被部分短视频和文章引用，认为是女记者立场不端、遭院士怒怼的铁证，但是从采访本身来看，记者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这期节目客观上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和话语权。若仅从记者的提问“那他会觉得说，中

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的话，那个基数太大了”“也可能他会觉得说，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便认定记者别有居心，实在有失公允。

质疑式采访决定了记者与受访者的立场必然对立^①。这种对立并不能表明记者的真实立场，也显然不是“无脑”政治不正确”。它是一种采访技巧，既能帮助被采访对象完整陈述观点，也能发现其中可能的逻辑漏洞。若将这样的质疑上升为立场和政治倾向问题，并进行人身攻击，发言者将陷入人人自危的窘境。《穹顶之下》多大程度唤醒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又在何种层面上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是现有资料无法确证的问题，民众多有揣测和论争，但是区分合理的质疑和不义的抹黑，警惕立场问题的扩大化，避免民粹主义愈演愈烈，确有其必要性。

而在国际传播中，若想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共故事，就必须关照西方可能的质疑并予以正面回应。时至今日，将丁仲礼和柴静的对话置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框架中予以审视，放在国际语境中予以考量，仍然具有其正当性和借鉴意义，这正体现了质疑性采访的价值。反观当下，许多正面报道正因为缺少质疑，无法形成对话，成为一种灌输式的单向传播。真理愈辩愈明，不应只是一句空话。

（三）记者介入的合理性与边界

关于柴静的另一争议在于，有观众认为，她自身受到过度关注，导致新闻的主体事件被掩盖^②。柴静容貌姣好、言语温柔、文艺气息浓厚，早期一直有“公知女神”的赞誉。B站的弹幕同样显示，观众对柴静的评论多

① 徐海龙,姜楠:《质疑式采访在新闻访谈节目中的内涵和价值》,《青年记者》,2018年第3期。

② 张慧娜:《从〈看见〉栏目浅析柴静在采访中的人文关怀》,《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第5期。

于被采访对象，但就反馈而言，她带来的是观众对当事人的关切而非漠视，并扩大了节目的影响力。

过往的观点认为，记者应当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事件，并与事件保持距离。但是批评者同样指出，客观主义是以形式的客观掩盖实质的主观。记者并不完全独立于事件，她必然会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和客观存在发生碰撞。忽视第三人的实质参与，无异于掩耳盗铃。不仅如此，由于不同主体的话语权、言谈艺术不同，缺乏价值观念和科学精神指引的新闻呈现往往堕入偏见和漠视的泥潭。在避免策划新闻或影响事件走向的前提下，记者有权介入和理解。事实上，也唯有真诚能换取真相。

在《告别卢安克》中，柴静问牙韩运记不记得说过什么台词，会不会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软弱。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给出答案，当场哭了起来，说肚子不舒服。柴静意识到自己施加了太大压力，她掏出手帕说：“对不起，韩运，我还是不够了解你。”在随后的交谈中，卢安克告诉她，“孩子野惯了，习惯于行动，而思考会让他们痛苦。”“比较调皮的小孩最在乎老师”孩子的天性与异常行为的合理性、卢安克对孩子的理解和独特的教育理念，都能借助细节表现出来，而记者的参与推动了整个认知过程。

在强调品牌效应的当下，记者鲜明的个性风格、讲故事的能力，更是突破公众新闻回避行为的关键。研究表明，公众的新闻回避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件让他们感受到不安、愤怒、无助等负面情绪，因而采取自我保护式的短暂回避，另一种是习惯性很少或不看新闻^①。

一个有感受力的记者自身就是一个传播媒介，一方面，她通过共情与

^① Stephanie Edgerly,李梓涵:《公众回避接触新闻的现象日益普遍》,《清研智库系列研究报告》,2020年第5期。

观众和当事人同在，能够分担一部分的消极情绪，展现同情式的理解；另一方面，她又能够以自身魅力带领观众走近事件和当事人。根据柴静的叙述，她追求的不是“平视”，而是浸泡进当事人的生活，让真相和生命自然地呈现出来^①。但记者作为公众人物，其品牌塑造应当服务于新闻工作，换言之，不能用超越新闻职业规范的方式维系声名^②，或是影响事件的客观呈现和误导观众。在这一界限内，记者应当有自身的裁量权。正如陆晔所说：“记者有很多种，记者不必完美”^③，他们需要在观众的审视和批判中不断寻找介入和表达的尺度。

四、结语

新闻业获得社会尊崇的关键在于践行社会公器的职能，这在后续兴起的解困新闻、公共新闻和建设性新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记者的使命。

自然科学的研究尚且需要伦理考量，遵循实证主义的新闻学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科学，更不能独立于社会正义获得其合法性。新闻不能仅仅只是记录信息的工具，它也必须同时以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目的。新闻公正的思想源泉只能来自于坚守同理心、维护生命权、促进社会公正的哲学本身。^④如果新闻有力量，新闻业有价值，那么其中的价值正在于此。

① 耿欣、蒋玉鼎：《柴静如何“看见”——对话央视综合频道“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中国记者》，2012年第1期。

② 王辰瑶：《新闻人要避免成为新闻话题——也谈闻丘柴静之热议》，《新闻实践》，2013年第3期。

③ 陆晔：《也谈电视记者这一行》，《东方早报》，2013年1月25日。

④ 杜骏飞：《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当代传播》，2022年第1期。